

# 1969 年中美关系解冻研究

## ——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郎 朗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对华政策,上任伊始便指示相关部门研究美国的中国政策(NS-SM14 报告),并多次组织跨部门会议对 NSSM14 报告进行讨论,最终确定了“接触加缓和”策略。之所以做出这一策略,中苏关系变化与台湾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变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中苏两国的分裂和对抗日益公开化,美国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虽然力求在中苏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是略倾斜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能完全接受中国关于“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台湾撤军以及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要求,但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与调整,极力限制台湾的军事力量以及向中国大陆挑衅。为了缓和中美关系,美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主动采取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放宽经济和旅行管制。对于美国的不断示好,中国给予了积极回应。经过不断地试探与磨合,中美之间的“小步舞”终于合上拍。1970 年 1 月 20 日,第 135 次中美华沙会谈举行,掀开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序幕。

**关键词** 尼克松;基辛格;台湾;中苏关系;中美关系

对 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前后的考察,国内研究已比较丰富<sup>①</sup>,尤其陶文钊、张曙光、李丹慧、张威等学者充分利用美国解密的档案,论述更为详细和完整,对于全面系统地认识解冻前后的中美关系大有裨益。上述文章主要集中于基辛格秘密访华(1970 年 9 月)至尼克松访华(1972 年 2 月)期间,着重分析和探讨了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变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对尼克松上台后到第 135 次华沙会谈<sup>②</sup>这段时间关注较少。骆亦粟外交官撰写的《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一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美第 135 次和 136 次华沙会谈及其之前的中美关系,但是外交官主要是依据自己的外交经历,而没有引用美国档案材料。

众所周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便处于严重的对立敌视状态,一方试图给另一方传递信息大多数时间只能借助于与双方均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建立沟通渠道,比如“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和“巴黎渠道”等,从

而实现两国的间接联系。如果说这些中美两国间接联系渠道的开通与利用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不容置疑,那么中美直接会谈(先是日内瓦会谈,后是华沙会谈)更是在改善两国关系的初级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第 135 次和 136 次华沙会谈的成功举行为基辛格秘密访华从而最终实现尼克松访华奠定了坚实基础。

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在参考美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从 1969 年 1 月尼克松上台到 1970 年 1 月举行第 135 次华沙会谈期间的美国认知变化与中美关系的缓和过程<sup>③</sup>。

### 一、美国对华政策选择

尼克松执政后不久,就指示相关部门研究美对华相关政策,经过论证、研讨和评议等,最终形成三种可供选择的对华政策:“维持现状”策略、“强化威慑和孤立”策略和“接触加缓和”策略。其中,“接触加缓和”策略逐步得到尼克松总统的认同和支持,成为撬开紧张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前几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上台后亦重视对华

政策,只是态度由强硬转向缓和。1969年2月初,尼克松便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跨部门小组(Interdepartmental Group for East Asia)负责总结美国前任政府的政策以及可能的新观点,研究美国的中国政策。基辛格认为,这一研究(国家安全研究第14号备忘录,简称“NSSM 14”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美国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现状;中国对亚洲的威胁及其意图;美国与其他大国对华政策的相互作用;美国对华新政策及可能带来的成本与风险<sup>④</sup>。

1969年4月2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NSSM14做出了回应。CIA认为:除了台湾之外,中国没有通过武力手段扩张领土的意图;中国现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争做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争取亚洲国家对其政策的认同以及控制台湾;由于中国对美国态度与政策的变化可能性较小,因此美国影响其态度与政策的能力有限。CIA认为,美国向中国“示好”(overtures)主要意在影响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后毛时期的领导人具有同样的民族主义情怀,也没有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但是新领导人的观念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的需求将会有所缓和。

CIA建议,除了维持现有政策外,美国可采取的两项替代性策略是强化威慑和孤立,或者减少冲突和国际孤立。强化威慑和孤立策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由于政策一再失败以及因孤立而日益增加的挫折感,后毛时期的领导人将会采取对美缓和政策。该策略要求:军事上,扩大对亚洲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增加部署战略和战术核战斗力;政治上,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立场,使北京确信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经济上,要求盟友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限制。

减少冲突和国际孤立的策略基于如下假设:逐步放松的外部压力将使后毛时代的领导人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及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态度和意图。该策略要求:军事上,不再强调军事遏制中国;政治上,公开承认中国行使对大陆的权力,单边减少或取消孤立中国的政治措施;经济上,放松贸易管控<sup>⑤</sup>。CIA对“NSSM14”报告的回应为以后讨论“NSSM14”报告做了铺垫。

1969年5月15日,基辛格担任主席、专门讨论和评议美国对华政策的高级评审小组会议举行,重点讨论“NSSM14”报告存在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与交换意见,会议达成一致,即逐步减少与中国的紧张关系<sup>⑥</sup>。此次高级评审小组会议为“NS-

SM14”报告的终稿定了基调。

1969年8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NSSM14”报告做最后的修订。国安会指出,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此,美国应该更加灵活地设定长期目标和利益,逐步改进、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设定了如下利益和目标:第一,避免美中之间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或冲突;第二,阻止中国政府与其他重要国家之间的联盟;第三,维持东亚地区的势力平衡;第四,承认中国并允许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就共同的经济社会利益开展合作;第五,缓和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允许中国参与军控和裁军等问题的讨论,实现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正常化等;第六,通过非武力解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使台湾问题的解决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第七,维护美国在台湾的存在对美国战略至关重要,这是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承诺,也是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战略所需;第八,只要台湾仍“独立于”中国大陆,美国鼓励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对区域经济发展与日俱增的贡献<sup>⑦</sup>。根据上述利益与目标,国安会对美国的三种对华策略进行了详细论证。

第一,“维持现状”策略。该策略基于如下考量:当前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十分有限,短期内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敌意。长期来看,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有可能增加,但是新领导人可能会减少对美国的敌视,美国应努力影响这一变化。该策略包括两点:防止中国对邻国或美国带来直接威胁;促使中国做出政策调整,不再挑战其他国家和现存的世界政治体系。美国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然而,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控制大陆的合法政府,而台湾只代表其实际控制的领土。美国向台湾承诺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但是反对台湾和中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美国继续将台湾作为军事基地,以履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承诺和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经济禁令,抵制其他国家与之进行自由贸易。美国力争避免美中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但同时支持中国周边独立国家的国防建设和反暴乱行动。美国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力图通过公开声明、放宽旅游和文化交流管制、大使级华沙会谈以及避免挑衅性的军事行动,鼓励中国加强与外部世界和美国的联系。该策略面临的问题是能否足以应对中国的长远问题?如果不能,替代性政策是什么?<sup>⑧</sup>

第二,“强化威慑和孤立”策略。该策略基于如

下考量:(1)政策屡屡失败和孤立挫折感日益增加的压力将使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重新评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从而调整其政策,减少中美之间的冲突;(2)美国缓和与北京关系的努力并没有使中国认识到需要缓和其政策。为了限制北京有效实施其现有政策以及加强亚洲盟国对美国承诺的可信度,美国增加其对亚洲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以保证北京支持的暴乱不会成功。加强美国的防御力和攻击力,使北京相信中国不能以其目前的状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该策略的反对者认为,目前对中国的威慑力已足够,对北京的进一步孤立可能会扩大北京目前造成的危险。反对者认为,无法预期通过武力可以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权,而且不太可能有效地孤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sup>⑨</sup>。

第三,“接触加缓和”策略。该策略基于如下考量:(1)外部压力减缓最有可能引致后毛时期的中国领导人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意图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2)美国当前过于重视威慑手段,而没有给北京留出更多介入国际社会并从中获益的机会。为了使北京能够重新评估其政策,在保持美国军事防御的承诺和继续阻止中国攻击其亚洲盟国的同时,美国应该逐步地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单方面减少或消除孤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以及默许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该策略的反对者认为,美国单方面的姿态(没有要求北京采取相应的缓和举措)可能会被认为中国当前好战方法是有效的,将加剧美国与亚洲盟国间的冲突。反对者还认为,由于北京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小,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只会扰乱当前美国国际合作的努力,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复杂<sup>⑩</sup>。

经过权衡与比较,第三种策略即“接触加缓和”策略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优选择,得到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的认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策略已成为美国的对华策略,因为还没有经过国会两院审议以及公众还不知晓。由此,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不得不实行看似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暗示要对中国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另一方面,公开场合仍坚持原有政策不变,例如继续维持对台湾的承诺。

## 二、中苏关系变化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松动,尼克松政府之所以能够迈出缓和与对华关系的实质性步伐,重要原因之一是此时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1969年开始,美国对中苏关系变化给予足够重视,密切关注着每一个细节。1969年2月,CIA的一份报告指出,“苏联正在加强其在中国边境的军事力量”,报告认为,“贝加尔湖东部军事力量和指挥结构的升级大大超过了维持边境安全的需要,这表明苏联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中国发起攻势。”<sup>⑪</sup>1969年3月,随着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的升级以及苏联对华核威胁的加剧,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和对抗日益公开化。这促使美国认识到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坚定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同北京建立联系的决心<sup>⑫</sup>。

针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美国开始着手研究美国的应对之策。5月15日,举行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及CIA等在内的多部门会议,会上基辛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苏关系的进程,是否应该支持其中一方。一些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美国试图发展与中国更好的关系必然破坏与苏联的关系。但是基辛格认为,历史经验告诉人们,面对两个势不两立的伙伴时,应该支持其中弱势的一方,并认为中美关系和好并不必然意味着美苏关系恶化<sup>⑬</sup>。

7月3日,鉴于中苏对抗日益激烈以及苏联致力于孤立中国,尼克松总统指示对美国的政策选择进行研究。该研究(即NSSM63报告)要考虑中苏对抗对美苏中三边关系产生的广泛影响,尤其是一旦苏中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该研究还要考察,如果中苏没有产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只是矛盾加剧,美国应该采取何种政策<sup>⑭</sup>。

8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威廉·海兰德(William Hyland)在提交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分析了美国面对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时可以采取的两种办法:严格的公正和偏向中国。海兰德认为,公平立场只存在于理论上,实践中,美国必须在同情某一方做出选择,因为无论怎么做,哪怕不作为,在某一方看来都是“有益于”另一方。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之一是不明确宣布采取公平政策,而是根据自利原则决定做出相应反应、声明以及针对实际情况采取行动。换句话说,美国行动不是依据公平或中立标准,而是取决于美国的国家目标<sup>⑮</sup>。

9月3日,部门际特别小组对NSSM63报告做出初步回应,形成特别委员会报告。从理论上讲,面对中苏两国失和且两国都处于美国利益的对立面这一情形,美国有四大战略选择:A.支持中国,避免其受到政治经济孤立;B.协同苏联孤立中国;C.采取“不干涉”态度,拒绝做任何可能被其中一

方认为是倾向另一方的举动；D. 致力于改善美中、美苏关系，并从中获益。尼克松总统在公开讲话中表示支持 D 战略。基辛格解释说，在公开场合，总统只能宣称不偏袒任何一方，实际上，在非战争的情况下我们会更倾向于中国<sup>⑥</sup>。

9 月 11 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苏总理高层接触，引起美国政府高度重视。9 月 23 日，基辛格致函尼克松说：不清楚柯西金访问北京的原因或目的是什么，从中苏双方的谈话中看不出有迈向和解的重大举措。但是会谈发生在双方边境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表明双方都致力于阻止更大规模和更严重的冲突发生<sup>⑦</sup>。

9 月 29 日，高级评审小组会议举行，评议 9 月 3 日的特别委员会报告，认为该报告需要修订，并阐述了如下三种可能性以及美国的政策选择：第一，中苏紧张状态持续但是不至于引发战争；第二，美国积极努力阻止战争的发生；第三，战争爆发，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一次性冲突，二是持久冲突。基辛格认为，偏向中国的观点符合“在非战情形下支持弱国对抗强国”的逻辑。基辛格还建议，应该考虑两种可能性：苏联摧毁了中国核能力的军事状态；苏联大规模卷入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状态。他认为，苏联和中国结盟不符合美国利益<sup>⑧</sup>。

10 月 17 日，国家安全委员对 NSSM63 报告进行深入讨论，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议题。关于美国的政策选择。选项 A 支持中国，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支持，例如支持北京的边界主张，不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实施这一战略可能有助于改善美中关系，延长中苏争端，但是这将引起苏联的不良反应。苏联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政策，力图分解西欧和美国结盟，赢得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支持，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并逐步实施自己的军事计划。选项 B 支持苏联，继续孤立中国，同时对苏联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予让步。但是结果可能更难与苏联打交道，苏联会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不利于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改善。选项 C 中立态度，有两种选择：选项一，美国不采取被一方认为支持另一方的行动。因此，既不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也要避免与苏联达成谅解。这种政策使中国卷入中苏争端的可能性降到最小，但是将阻碍美国追求自身的利益。选项二，面对中国和苏联，美国追求自己的长期利益，无须过多考虑任一方对美国行动做何种解读。在实施该政策时，美国应该尝试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继

续支持台湾，并寻求就重大问题与苏联进行协调。该选项能使美国更自由地发展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过这有一定难度，因为要随时考虑双方的反应。

关于中美苏三方关系。中苏关系是当前苏联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不清楚苏联是否决定对中国实施突然的军事打击，但是可以预期，莫斯科方面会继续努力加强在中苏边界的军事存在，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巩固苏联的整体安全地位，降低中国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保护在中东的政治利益，并与西方国家建立较少敌对的关系。如果苏联相信中国正在突破孤立局面，尤其是发现中美关系正逐渐缓和，苏联会改变其政策。这有两种可能：其一，苏联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整体军事实力、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对美国采取更敌对的态度；其二，苏联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甚至不惜在具体问题上让步。中国也将苏联视为最直接最具威胁的对手。尽管相对于苏联，中国的军事实力明显偏弱，但是中国并不害怕与苏联的战争，且已做好战争准备。这有可能促使中国寻求与第三方国家改善关系，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不再敌视美国。

报告认为，中美苏三角关系是不平等的：美国和苏联的利益在世界很多领域相互交织，而中美之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在可见的未来，中苏对于世界的看法与美国不同。因此，在中国或苏联发生深远的变化之前，要解决相互之间关键性的差异是不可能的。然而，大体上，三个大国中的每一国都想避免其他两国相互勾结或者任一敌对势力的权力膨胀建立在牺牲另一方的基础上。关于中苏冲突带给美国的影响。中苏分歧日益严重，使两国的政策选择不太可能威胁到美国利益，而美国能从中苏对抗中获益，因为中苏对抗使双方都致力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中苏战争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和持续时间、美国对战争双方的态度和战争的结果。如果中苏战争没有第三方（除了蒙古）直接参与，且只使用传统武器，这样的战争不一定对美国不利，因为：第一，中国和苏联实施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的能力急剧下滑；第二，中国和苏联对河内援助的减少使越南政治解决的前景大大提高；第三，有助于美国改善与急于加强自身安全的第三方国家的关系。然而，如果亚洲或欧洲的第三国卷入其中，或者如果在冲突中使用了核武器，那么美国将会面临严峻的危险和问题。在中苏战争爆发之际以及战争期间，美国对苏联和中

国的态度对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有极大影响。如果美国明确表示支持冲突中的一方,美国将不能从另一方获益,与不支持美国立场的第三方国家的关系发展将会很困难。如果美国采取中立立场,在与第三方国家发展关系时更具灵活性,也可以迫使苏联和中国做出让步,以确保美国不卷入其中,因为两方都担忧美国会支持另一方。美国在直接影响莫斯科或北京与另一方的关系上能力有限,因为没有一方认为这一问题涉及美国的合法利益<sup>③</sup>。

11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致函基辛格,他认为NSSM63报告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过于夸大了美国从中苏争端中获得利益的可能性;第二,忽略了中苏战争带来的严重副作用;第三,没有对很有可能发生的中苏全面战争给予足够重视。NSSM63报告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争端会使苏联和中国无暇考虑反美政策,因此很难损害到美国。但是从过去8年的经历中,莫里斯认为这一判断是有问题的,比如苏联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构成对美国的威胁。NSSM63报告认为,中苏战争迫使苏联在SALT或欧洲安全等问题上妥协、降低中国对美国的敌视程度、降低中苏两国制定对抗美国政策的能力。莫里斯认为,上述观点要么忽视了中苏战争的原因,要么还没有得到证明。莫里斯还认为,NSSM63报告没有探讨中苏战争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即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突袭。莫里斯最后总结自己的观点:第一,中苏对抗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第二,报告应该包含中苏战争的意外事件;第三,中苏对抗不应成为美国改变对中或对苏基本政策的理由<sup>④</sup>。

11月20日,高级评审小组会议召开,继续讨论NSSM63报告。评审小组认为,应把美国在中苏争端中的中立与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的中立区分开来<sup>⑤</sup>。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这一时期,美国力求在中国和苏联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是略偏向中国。美国极力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维持平衡,例如1969年9月9日,尼克松告诉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Walter Stoessel),在中苏代表都参加的公开场合,如果会见中方代表,一定也要找机会会见苏联代表,要给外界一种美国平等对待中苏两国的感觉<sup>⑥</sup>。在美国已决定要与中国重启大使级会谈时,美国军控及裁军局局长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和美国驻苏联大使汤姆森大使提议,在美国重启会谈被公众知晓之前应该通知苏联驻美国

大使多勃雷宁,主要目的是打消苏联的疑虑<sup>⑦</sup>。

### 三、台湾问题

“台湾议题”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复杂、最为棘手的问题,贯穿于整个中美关系史,中美关系缓和的过程也不例外。美国清醒地意识到,台湾问题(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sup>⑧</sup>。美国无法完全接受中国关于“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台湾撤军以及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要求,但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还是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与调整,极力限制台湾的军事力量以及向中国大陆的挑衅。

#### (一)关于“台湾”武装力量的重组、缩编和现代化

美国不反对台湾重返大陆,统一中国,但必须是通过和平方式而不能采取武力。为此,美国对“台湾”本土武装力量的要求是防御型而不是进攻型。1969年1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理查德·斯内德(Richard L. Sneider)在提交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出,台湾现有的武装力量大大超出台湾防御所需,对台湾的经济发展造成日益严重的负担。他提议对台湾的武装力量进行改组和缩编,成立美台联合咨询委员会,并提出三点建议:停止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只有义务确保台湾武装具有防御台湾和澎湖的能力,其他沿海岛屿是台湾自己的事情;军队缩编和现代化。蒋介石对于美国的“台湾武装重组与现代化”提议表示强烈反对:军队重组是台湾的内政,美国的提议严重损害了“台湾”的自尊与主权,建立联合咨询委员会将产生严重的“政治”负面影响;该提议说明美国更关心台湾军队缩编而不是现代化。

美国同意台湾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但是对于台湾对特别先进武器的需求持谨慎态度。12月11日,美国国务院提出支持台湾的两项提议:第一,通过新的公法480(PL-480)协议,支持“台湾”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先锋”项目(Program Vanguard)。第二,援助3100—3600万美元升级台湾空军防御力量,用于编制一个F-104中队,一个Nike-Hercules大队和一个Hawk大队,同时升级台湾的航空控制和警报系统。第一项获得批准,第二项被推迟<sup>⑨</sup>。关于台湾购买F-4s和潜艇,美国以前者太昂贵,后者与台湾防御要求不相关为由予以婉拒<sup>⑩</sup>。1970年1月初,副总统阿格纽访问台湾期间,两次被问及F-4s,阿格纽没有具体谈F-4s,只是说,“美国知道台湾航空防御的

最高需求,愿意支持更新台湾的航空防御,但是围绕《对外援助预算法案》有许多困难的政治问题”。他甚至委婉地向台湾提出批评,要求台湾从美国角度考虑问题,并提醒他们,“受援国不能替美国做出提供什么物品的决定”<sup>②</sup>。

## (二)关于台湾攻击中国船只

美国以维护台湾海峡及东亚地区的安全为由,反对台湾向中国大陆发起任何形势的军事挑衅。1969年7月2日,在“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授权下,至少5艘台湾舰船在福建塔城附近炮击中国大陆的船只,其中几艘帆船和一艘木制小炮舰被击沉<sup>③</sup>。就台湾袭击中国大陆船只一事有可能造成的心理和政治影响,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专门约见“副总统”蒋经国。马康卫指出,在当前节点上,美国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任何哪怕规模很小的敌对行动,强调限制任何有可能造成台湾海峡或东亚其他地方紧张局势的行動的重要性。因为类似行为有可能会对巴黎谈判以及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产生负面影响。蒋经国向马康卫保证,台湾无意造成东亚地区的不稳定,这只是一个小型的勘察行动,与前几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这一行动不是台湾海军而是民间力量发起的。此次勘察没有军事目标,被击沉的几艘小船也没有军事价值。其目的是探试恶劣天气下中共雷达探测网络的有效性,以便确定中共人员的警惕性。蒋经国相信,和之前一样,中共除了有可能攻击台湾供给船只之外,不会出于报复而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关于为何行动之前没有告知美国的询问,蒋经国说会通知新任“国防部长”,将来所有类似行动会提前与美国协商。蒋经国衷心希望美国不要对该事件“过度紧张”<sup>④</sup>。

## (三)关于美国调整台湾海峡巡逻

美国撤销两艘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这在台湾“朝野”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不得不出面做出解释,以打消台湾的忧虑。1969年9月23日,美国国务院向驻台使馆及美国台湾防御司令部司令官发电报称,由于军事预算大幅削减,需要对台湾海峡巡逻做出调整,由第七舰队负责今后间歇性的巡逻。为了减轻台湾的安全担忧,美国澄清:第一,巡逻调整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承诺,第七舰队仍然执行《共同防御条约》的任务;第二,第七舰队继续停靠在台湾港口,在台湾海峡仍能见到它;第三,美国将满足台湾对水面舰艇的需求<sup>⑤</sup>。

台湾对此决定显然很敏感,“台湾外交部长”魏道明(Wei Tao-ming)代表台湾表示,从技术上来

讲,(巡逻)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却可能在中国和台湾产生严重的影响,他恳请美国重新考虑这一决定<sup>⑥</sup>。11月14日,蒋介石给尼克松写信,对美国撤出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表示担心。美国助理国务卿帕卡德(Packard)和海军上将麦凯恩(McCain)向蒋介石保证,第七舰队将继续对海峡维持有效监管。在得到这一保证后,蒋介石不再反对撤出两艘驱逐舰。但是蒋介石仍然担心,这将激励中国大陆加大对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的进攻<sup>⑦</sup>。12月27日,尼克松在让马康卫转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台湾海峡巡逻调整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考虑,第七舰队的作用、任务或责任没有变化,美国的防御承诺没有变化,美国执行承诺的能力也没有变化。尼克松专门强调,不会让中国产生任何误解,如果中国利用美国调整巡逻的机会进攻台湾在台湾海峡的船只,美国政府将认定为非法行动。另外,还提到第七舰队现在每月通过台湾海峡的次数大大增加,较之前两艘驱逐舰对台湾海峡的定期巡逻更为频繁<sup>⑧</sup>。蒋介石对此回复表示满意。

## (四)关于美国的中国政策

台湾特别关注美国的中国政策,美国政府对此的表态是:一方面向台湾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影响到美台关系,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变;另一方面承认美国的台湾政策限制了美国的行动,但是并无承诺如若调整对华政策需要事先争得台湾的同意<sup>⑨</sup>。

台湾对尼克松上台以来的对华政策颇有微词。1969年1月26日,在与美国驻“台湾官员”讨论意大利和加拿大可能承认中国的会谈中,蒋介石直接指出,当前有些国家承认中国与美国政府有很大关系,例如美国与中国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以及尼克松强调和平、和解与谈判的就职演说,对他国是一种误导。蒋介石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以防止产生“雪球效应”(snowball effect)<sup>⑩</sup>。

1969年8月6日,台湾驻美国大使周书楷(Chow Shu-kai)约见基辛格时质疑:根据尼克松总统全球之行的新闻报道,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已发生变化?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访问的目的是保障美国在亚洲发挥最大作用,在越南问题上拥有战术灵活性以及对河内造成最大的压力。基辛格保证,美国对中国的根本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变化,美国仍将继续支持台湾<sup>⑪</sup>。

8月8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时表示,非常怀念杜勒斯任国务

卿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但此后美国的中国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罗杰斯声称时光不能倒流回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或肯尼迪时期,但是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没有变。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尼克松总统是否支持“台湾”返回中国大陆并解放中国人民的问题,罗杰斯回答,如果台湾能够通过和平方式重回大陆,美国当然愿意,但是不赞成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冒险<sup>③</sup>。

12月17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会见蒋介石,传达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关于美国的中国政策,美国政府完全意识到中国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威胁,不会制订任何有可能加强中国能力从而给邻国或世界其他地区制造麻烦的政策。美国将一直对此保持警觉,执行其对该地区的承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有义务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降低该地区的紧张态势,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和平关系。基于此,美国真诚期待恢复与在中国华沙或其他地方的会谈,为此美国还专门做出调整。比如,放宽对贸易和美国居民旅行的限制。马康卫表示,美国政府已非常坦诚地向台湾表达美国的意愿及目的,希望能够得到台湾的理解。尼克松还保证,美国的中国政策绝不会影响(或损害)台湾的关键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并不意味着:第一,外交承认中国或者促进其国际认可;第二,降低美国应承担的防御力度;第三,相信中国政权会发生本质变化,或者信任中国政权;第四,放弃减缓东亚地区紧张局势的基本原则<sup>④</sup>。

#### 四、美国缓和中美关系的努力

1969年初,中国取消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后,美国并没有停止缓和中美关系的脚步,而是继续利用各种渠道,寻求各种机会探索同中国的接触。

##### (一)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

1969年初,尼克松总统及基辛格通过各种渠道,向多个国家领导人表示,美国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其2、3月的首次出访中,尼克松告诉法国总统戴高乐,“从长远来看,承认中国和苏联是大国,并与之建立平行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sup>⑤</sup>。

在7月24—8月3日的全球访问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希望缓和中美关系的愿望。8月2日,尼克松告诉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美国之所以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是因为中国对邻国的态度而不是“中国内政”。他补充说:“我们的政策是发展与苏联的良好关系,而当中国改变其对他国的政策时,我们将开

放渠道与之建立关系。”尼克松强调,美国无意卷入中苏冲突,不会“加入孤立中国的集团”<sup>⑥</sup>。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讨论了中苏关系、中巴关系和中美关系,尼克松同意叶海亚汗允许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看法,但是由于美国公众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建立邦交的准备,美国政府不能“马上”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他承诺会为之努力。尼克松总统希望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能够将美国希望与中国和解的信息转达给周恩来<sup>⑦</sup>。

10月16日,巴基斯坦信息与国家事务部部长谢尔·阿里(Sher Ali)会晤基辛格时称,叶海亚汗总统已转告周恩来,美国乐于与中共和解。谢尔·阿里称,巴基斯坦国参加北京20周年纪念庆典的代表已转达,叶海亚汗准备与明年初访问巴基斯坦的周恩来讨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意图。基辛格告诉谢尔·阿里,如果叶海亚汗总统有机会与中国大使进行交流,可以秘密地告诉中方,美国已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sup>⑧</sup>。

12月23日,基辛格会见巴驻美大使希拉利。希拉利将近期叶海亚汗总统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间的交流信息传达给基辛格。基辛格要求希拉利向中方转达,美国真心愿意与中国举行会谈,假若北京要求会谈采取比华沙更安全的方式,或通过官僚机构以外的少一些招摇的渠道,希拉利可以做出相应安排<sup>⑨</sup>。

##### (二)美国主动采取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

除了通过间接途径了解中国信息、表达美国愿意与中国接触的要求外,美国还积极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以显示美国的确在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而努力。

1969年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堪培拉面向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讲话中指出,美国“一直致力于打开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并放宽对中国护照和旅行的限制。8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杰斯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sup>⑩</sup>。

9月5日,副国务卿理查德森(Elliott Richardson)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政治协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不寻求利用中苏间的战争来实现自身利益。两大共产主义强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与我们无关。”<sup>⑪</sup>

9月9日,尼克松在与基辛格和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会见时要求斯托塞尔在适当时候接触中方



代表,告之后者总统致力于与中方举行会谈。总统称,美国政府重要官员必须意识到,要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不能孤立这样一个大国及其人民<sup>⑥</sup>。

9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公开的理由是经济原因,不得不大幅削减军事预算<sup>⑦</sup>。但其中不难窥见,这至少部分表示美国主动向中国示好的姿态。

12月初,斯托塞尔在参加一个由南斯拉夫政府组织的外交招待会上与一名中国代办的翻译进行了接触,向其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严肃认真的会谈”。12月10日,中国使馆电话联系美国驻波兰使馆,提出第二天举行会谈。12月11日,斯托塞尔到中国代办雷阳的住所,他建议在1月12日至16日这一周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址可在两使馆轮转,而不是在“中立的”波兰会场。他同时表示,美国愿意将会谈移到另一城市<sup>⑧</sup>。

### (三)放宽经济和旅行管制

尼克松上台伊始,便致力于“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如何做到既对华显示缓和的诚意又不至于唐突冒进;如何既能使中方感知实际收益又不至使美方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失。逐步放宽对华经济管制成为可供一试的政策选择<sup>⑨</sup>。

1969年6月11日,尼克松总统在与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Marshall Green)的谈话中,表示支持采取一些诸如放宽贸易和旅行管制的措施,而且并不要求互惠<sup>⑩</sup>。6月26日,尼克松总统决定修改对华贸易控制政策(NSDM17),主要有四个内容:第一,取消《国外资产管制条例》中对美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从事对华交易的限制,但规定这些交易必须属于巴黎统筹委员会设定的非战略交易;第二,调整《国外资产管制条例》禁止购买中国产品的限制,允许在国外旅游或居住的美国人以非商业进口目的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第三,调整《国外资产管制条例》和出口管制的规定,允许为食品、农业设备、化肥和药品等产品的出口发放一般许可证;第四,在上述步骤之后的适当时机,调整对非战略商品的进出口管制以平衡贸易。尼克松希望这些决定能够尽早实施<sup>⑪</sup>。7月10日,理查德森在提交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建议他在7月23日启程访问前授权实施NSDM17的各项政策<sup>⑫</sup>。

12月2日,国务卿罗杰斯致函尼克松总统,建议立即实施以下放宽对华经济限制的措施:第一,取消《国外资产管制条例》对美国公司的海外分支

机构与中国从事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的非战略交易的限制;第二,取消现行限制,允许美国商人参与第三国涉及中国产品的交易;第三,微调尼克松于6月批准的允许在海外旅游或居住的美国人以非商业性目的购买中国产品的政策,取消100美元的上限,取消从中国进入美国的非商业性进口需作为随身携带行李的要求<sup>⑬</sup>。

## 结 语

对于美国的不断示好,中国做出了越来越明确的回应。1969年8月份,巴基斯坦空军中将努尔汗(Nur Khan)在与基辛格会见时指出,中国有意想向美国传达,中国视苏联而不是美国为最大的敌人<sup>⑭</sup>。9月25日,法国驻中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Etienne Manac'h)在与周恩来进行会谈后指出,明显地感觉周恩来在谈论美国时较之以前更为平静<sup>⑮</sup>。12月7日,中国代表通知美国驻华沙大使馆,释放两名于1969年2月16日因误入中国领海而被中国当地政府拘留的美国人。中国表示,这是对美国放松贸易限制,结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及反对苏联提出美苏联合对抗中国等一系列行动的反应<sup>⑯</sup>。12月23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向基辛格转达叶海亚汗总统有关中国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中国愿意无条件地与美国在华沙重启大使级会谈别”<sup>⑰</sup>。

经过自1969年初以来近1年时间的不断试探与磨合,中国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小步舞”(基辛格语)终于找到了合拍。1970年1月20日,在经历多次延迟后,第135次中美华沙会谈终于举行,一个月后,第136次华沙会谈举行。两次会谈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sup>⑱</sup>,双方商定,将在北京举行更高级别的谈判,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尽管高级别的谈判因美国出兵柬埔寨等一再推迟,但是中美恢复邦交的步伐已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

### 注释

①文章主要有:张曙光:《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兼论外交决策者个人因素》,《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李丹慧:《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来自尼克松外交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2期;贺平:《尼克松政府初期美国放宽对华经济管制的政策评析》,《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宫力:《毛泽东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谈判中的台湾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钟龙彪:《中美首次高级会晤中的交流与交锋——来自中国、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当代中国史



研究》2010年第5期;余玮:《中美关系“解冻”的背后》,《党史纵横》2009年第3期;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年第4期;南山:《瞩目世界的握手——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纵横》1995年第5、6期;张静:《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与谈判策略》,《党史博览》2014年第7期;张静:《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党史文献》2013年第2期;马骏飞:《基辛格与中美关系解冻的“巴黎秘密渠道”》,《学理论》2009年第16期;张威:《从中美关系“解冻”看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分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②在1968年1月8日举行的中美第134次会谈上,中美双方商定第135次会谈于1968年5月29日举行。但由于种种历史事件和因素的影响,直到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华沙会谈才最终得以举行。

③需要说明的是,中美关系缓和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是限于篇幅,本文很少涉及中国方面关于中美关系的认识。

④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February 5,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8. 尽管“NSSM14”报告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但是从后面对“NSSM14”报告的反应中可以推断,“NSSM14”报告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持保留和谨慎态度。

⑤Summary of the CIA Response to NSSM 14,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30-31.

⑥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Washington, May 15,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31-39.

⑦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August 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2.

⑧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August 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3-64.

⑨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August 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4.

⑩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August 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4-65.

⑪“Recent Military Developments Al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69-5, February 5; ibid., Box 1, President’s Daily Briefs.

⑫张静:《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与谈判策略》,《党史博览》2014年第7期。

⑬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Washington, May 15,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36-37.

⑭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63, Washington, July 3,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42.

⑮Memorandum from William Hyland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August 2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71-74.

⑯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Washington, September 25,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93.

⑰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September 23,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86.

⑱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Washington, September 25,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92-92; 94; 96.

⑲Draft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63, Washington, October 17,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08-112.

⑳Memorandum From Roger Morr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November 1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25-129.

㉑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Washington, November 20,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29-137.

㉒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September 9,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80.

㉓Memorandum from Helmut Sonnenfeld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December 11,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45.

㉔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August 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59-60.

㉕Memorandum from Laurence E. Lynn, Jr. and Lindsey Gra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January 2, 1970.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57-158.

㉖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450, President’s Trip Files, VP Trip East Asia Jan 70;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December 9,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43-145.

㉗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January 10, 1970.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59.

⑳ Telegram 2442 from Taipei, July 4; *ibid.*, Box 519,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 Vol. II.

㉑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uly 4, 1969, 1350Z.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43-46.

㉒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mmander, U. 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Washington, September 23, 1969, 2117Z.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88-90.

㉓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Evening Report, Washington, November 12,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22.

㉔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December 9,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43-145.

㉕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December 17,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46-151.

㉖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August 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0.

㉗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anuary 26,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

㉘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ugust 6,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53-54.

㉙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August 8, 1969, 1021Z.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55-56.

㉚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December 17,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46-151.

㉛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General De Gaulle, March 1, 1969;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447, President's Trip Files, Memcons—Europe. Editorial Note,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51.

㉜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President Ceausescu, August 2;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1023, Presidential/HAK Memcons, Memcon President Nixon and President Ceausescu August 2-August 3, 1969. Editorial Note,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52.

㉝ Report Attached to Memorandum from Harold Saunders to Kissinger, September 2;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641, Country Files, Middle East, South Asia, Vol. I. Editorial

Note,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52; Memorandum from Lindsey Grant and Hal Saunde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August 21,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9.

㉞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October 16,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07-108.

㉟ Kissinger to Nixon, December 23,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54.

㊱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September 1, 1969, 180; September 8, 1969, 201-208.

㊲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September 22, 1969, 257-260.

㊳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September 9,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80-81.

㊴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Evening Report, Washington, November 12,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22.

㊵ Telegram 3706 from Warsaw, December 3;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69, POL 23-8 US; Telegram 3744 from Warsaw, December 10;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OL CHICOM-US; Telegram 3760 from Warsaw, December 11;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OL CHICOM-US.

㊶ 贺平:《尼克松政府初期美国放宽对华经济管制的政策评析》,《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

㊷ Memorandum from Sneider to Kissinger, June 11;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957, Haig Chronological File, HaigChron-June 1969.

㊸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17, Washington, June 26,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40.

㊹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July 11,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46.

㊺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ogers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December 2,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41.

㊻ Memorandum from Lindsey Grant and Hal Saunde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August 21,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69.

㊼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

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October 8,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05.

⑤⑥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December 23, 196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54.

⑤⑦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

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155.

⑤⑧ 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 梅莉

## America's Cognition Change and China-US Relations(January 1969—January 1970) ——Based on the Study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Lang L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Concerned with American policy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instructed relative agencies to study U. S. foreign policy to PRC(NSSM14) right after the inauguration. After several interdepartrmental meetings on NSSM14, they finally decided on the strategy of "reduction of PRC's isolation and US-PRC conflict". Major reasons for that are the chang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aiwan issues, the former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When faced with the split and open confrontations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China, U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 neutral attitude towards both sides, yet slightly inclined to China. On Taiwan issues, America could not accept the PRC's claims that American must withdraw military troops from Taiwan and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at Taiwan issues were PRC's internal affairs. But in order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US made concessions and adjustments on Taiwan issues, strongly restricting Taiwan's military strengths and its attempts to provoke the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ease the relations, America expressed its desire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with PRC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and relaxed the controls in economy and travel. The PRC responded actively to such measures of America. The PRC and US finally found the same pace of "small dance" after many efforts. The 135<sup>th</sup> Warsaw Talks of American and PRC were held on January 20, 1970, which marked the prelude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Key words:** Richard Nixon; Henry Kissinger; China-US relations